学术专论

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早期纂修考

——以新见内府稿抄本为中心

陈丹琪

[摘要]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稿本在初次进呈后的修改过程中，清廷便抽调纂修人员从中纂出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二书于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后，《简目》稿本吸收了《总目》稿本关于书名、卷数的修改意见，但鲜少修改正文。《简目》稿本在校订时便开始誊抄副本，以备入阁，但因《总目》改纂时间长、变动大，《简目》文本理当随之变化，因此乾隆四十八年前后抄成的四份《简目》均遭弃置，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当属其一。后来抄成并入阁摆架的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等《简目》，系稿本修订时逐渐形成的文本，或因办理时间紧张，存在诸多舛误，亦未全部吸收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意见。

[关键词]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 纂修 稿本 抄本

[**中图分类号**] K249.3 [**文献标识码**] A [**文章编号**] 1002－8587（2025）－05－0121－010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（以下简称为“《总目》”“《简目》”）是清高宗时期办理《四库全书》过程中产生的两种重要文献，其内容和价值各有侧重。《简目》由于刊刻早，流布广，对清人读书藏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近年来，学界对《总目》的讨论已较为充分，《简目》研究虽有推进，但仍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。其中，首先待解决的即是《简目》的纂出和修订过程。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略是：《简目》的编纂源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七月二十五日发布的谕令，直到乾隆四十六年二月《总目》进呈后才由此析出，并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《总目》进呈前的修改内容；《简目》入阁后经过覆校时的撤换和重新缮写。[①]但《简目》具体如何从《总目》中纂出，《简目》何以进行重抄，《总目》《简目》在同时校改的过程中如何互动等问题，还有待进一步发覆。

重庆图书馆藏有2册《简目》内府写本，此前仅见沈津简单介绍。[②]随着四库学研究尤其是

［**收稿日期**］ 2024－10－28

［**作者简介**］ 陈丹琪（1991— ），女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北京 100875，chendanqi@mail.bnu.edu.cn

［**基金项目**］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“《永乐大典》综合研究、复原”（21@ZH046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琚小飞、党瑞林：《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〉纂修考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24年第5期。

② 沈津：《校理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残稿的一点新发现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2年第1期；沈津：《稿本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〉》，《书城挹翠录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51−52页。

《总目》稿本研究的发展，如今可以更好地认识此本的性质和价值，也可以此串联其他版本，进一步探讨前述《简目》早期纂修工作。本文所言的“早期”，即以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前后，北四阁《简目》抄本完成为限。

一、现存《简目》内府稿抄本概述

要讨论《简目》的纂修过程，可以借助此书存世的版本。据调查，《简目》现存版本大致可分为内府、民间两个系统。民间流传的版本以乾隆四十九年刻本、乾隆六十年刻本为代表，[①] 其他民间刻本、抄本多源于此。由于这两个刻本的底本自四库馆抄副流出后，皆经过四库馆以外的学人（如民间的鲍廷博、鲍士恭及金德舆等虽在朝为官而实未预内府修书事的学者）校改，实际上已融入了非四库馆学人的学术意见，因此，不能直接将这两个刻本与四库馆纂修的诸种内府稿抄本《简目》视为同一编纂性质的文本，在讨论《简目》的纂出和修改过程时，需以内府稿抄本为主。

目前留存的主要的《简目》内府稿抄本基本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重庆图书馆藏写本

重图藏本《简目》，索书号：B05/1:4/0335。存 2 册，凡 1 卷，为卷十五集部楚词类、别集类一（汉至五代），别集类二（北宋建隆至靖康）。红格，四周双边，栏框高 21.5 厘米，宽 15 厘米，单鱼尾，版心上题“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”，其下依次书写部、类名和卷次，版心下端题写叶码。半叶 9 行，行 21 字，小字双行同。书名顶格，用大字书写，提要低二格（实 19 字），用双行小字写。遇尊称（如“国朝”）则抬一格写。正文悉为馆阁体，间有墨笔修改，提要间有朱圈断句。天头犹有黄签痕迹，但签条已不存。每两叶之间钤有“翰林院印”满汉文骑缝章。另钤有“固始许霁祥藏书”“许光宇”“重庆市图书馆藏善本”三印，知为许霁祥旧藏，后归于重庆图书馆。许霁祥，字光宇，生卒不详，河南固始人。喜收藏、传拓碑版，与马衡交好。

（二）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

国图抄本《简目》，善本书号：09785。[②] 存 21 册，全 20 卷。红格，四周双边，栏框高 22.3 厘米，宽 15.3 厘米，单鱼尾。半叶 8 行，行 21 字，小字双行同。第 1 册为卷首表文与职名表，版心题写“钦定四库全书”；其余 20 册为正文，版心题写“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”。其余版心信息及正文大小字、抬格等抄写格式皆同于重图藏本。

（三）阁抄本

阁抄本即最终随《四库全书》入藏诸阁的《简目》抄本，现存文渊阁本、文溯阁本、文津阁本、文澜阁本四种。[③] 其中，文渊阁本、文溯阁本、文津阁本皆为全本，文澜阁本因经过兵燹，仅存 6 卷原抄本（卷九至卷十二、卷十七、卷十八），其余皆为补抄。这四种阁抄本皆为红格，四周双边，单鱼尾。半叶 8 行，行 21 字，小字双行同。大小字、抬格等抄写格式基本与重图藏本相同。唯小字内容的篇末栏格未被写满时，文澜阁本作双行对称书写，其他本则径作单行直书。由于文溯阁本目前难以得见，文澜阁原抄本卷次有限，下文主要利用的阁抄本为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两种。

---

①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又称“赵怀玉刻本”“杭州本”等，乾隆六十年刻本又称“谢启昆刻本”“湖州本”等。

② 全书书影已公布于国家图书馆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。

③ 除文溯阁本《简目》外，另外三种阁抄本皆已影印出版，分别收于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；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；《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6 年；《景印文津阁四库全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 年；《文澜阁四库全书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15 年；《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17 年；等等。

二、重图藏本《简目》性质申说

沈津将重图藏本《简目》定性为“稿本”，但论述未详，现从成书时间、修改笔迹、实物形制和办理人员题署四方面进一步申说。

图书更名是四库学研究中判断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。重图藏本《简目》底稿著录有萧云从“《离骚图》一卷”，提要前后画有勾删符号，当出于馆臣之手。《离骚图》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零页中不可见，天图稿本、殿本《总目》中著录为“《钦定补绘离骚全图》二卷”，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则著录为“《钦定补绘离骚全图》三卷”。核文渊阁、文津阁四库本，皆题名“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”，3 卷。查纂修档案，此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曾有要求订正补画的谕旨，[①] 天图稿本、殿本《总目》皆谓“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”，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中亦言“乾隆四十七年特命内廷诸臣考订补绘”。由此观之，此书更名当在谕旨下发以后，则重图藏本底稿应当形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，早于纂修档案所载的四十七年七月《简目》稿本进呈时间。

从修改笔迹看，重图藏本《简目》当为四库馆原物。此本之上的 2 条眉批，字迹与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上有“总纂纪记”落款的眉批相同，知这 2 条眉批当出自纪昀之手。另外，还有些修改痕迹可看出并非纪昀所书：重图底稿作“《乐全集》四十卷”，修改稿在其后增加“《附录》一卷”四字；重图底稿作“《西塘集》十卷”，修改稿在其后增加“《附录》一卷”四字。[②] 两处相同的这 4 个字显然出自二人之手，后者为纪昀字迹，前者则不确定。总之，重图藏本《简目》的修订应当经过多人之手，与《总目》稿本的修订相类。

四库馆正式稿抄本皆有一定的形制要求，故可借此判断文献的性质。从实物形制看，重图藏本《简目》的版式、行款、抄写格式皆同于进呈稿本《总目》，而行款则别于各阁抄本《简目》（后者皆为半叶 8 行）。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永瑢奏折云：

> 统俟发下后，拟将《简明目录》缮写正本，陈设于经部第一架第一层之首，仍遵将历奉修书谕旨恭冠目录之首……其《总目提要》及《考证》全部，臣等均拟缮写正本，于文渊阁中间东西御案上次第陈设。[③]

“正本”是个重要的切入点。（1）从奏折可知，进呈稿本《总目》《简目》都不是入库的“正本”，抄入阁书的才是。（2）观察行款，各阁抄本《简目》《四库全书》皆为半叶 8 行，而《总目》《考证》则为半叶 9 行，此系因最初构想的陈设位置不同，[④] 即使是“正本”，行款亦有别。[⑤] 阁抄本《简目》随库书摆架，故行款与库书统一。重图藏本《简目》为半叶 9 行，并不符合阁抄本《简目》的形制。

办理人员的题署同样可资参照。（1）稿抄本《总目》方面，文溯阁抄本书后有协勘官、誊

---

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1449 页。

② 这两则修改意见，国图抄本《简目》未吸收，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则作“《乐全集》四十卷《附录》一卷”，“《西塘集》九卷《附录》一卷”。复核二书，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所载为确，也可视作吸收了重图藏本的修改意见。

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603 页。

④ 从《文渊阁四库全书分架图》《四库书目度藏表》看，经部第 1 架第 1 层第 1 至 3 函皆题为“目录”。从函盒数量看，此确是《简目》而非《总目》。

⑤ 此处主要指文渊阁的情况。文澜阁抄本《总目》为半叶 8 行，推知南三阁抄本《总目》皆当如是，此或因南三阁与北四阁性质有别，无须单独陈列《总目》，故南三阁《总目》也用与库书相同的 8 行纸抄写。崔富章言文澜阁原抄本《总目》不集中一体存放，而是解体为四，绢面分色，各自置入库书四部之首，可证此想。按，崔氏言此本行款为“每半叶九行”，误。（崔富章：《文澜阁〈四库全书总目〉残卷之文献价值》，《文献》2005 年第 1 期）文澜阁原抄本《总目》书影可参见顾志兴：《文澜阁与四库全书》（杭州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96 页），浙江图书馆著录行款亦为半叶 8 行。

录监生的落款，[①] 进呈稿本则无。（2）《简目》方面，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溯阁本、文津阁本亦有相关协勘官、誊录监生的署名，重图藏本则无。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的纂修是集体成果，稿抄本有此差别不难理解：（1）稿本需进呈御览，不便著录具体办理人员姓名，否则对其他未参与纂修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的人员而言有失公允。[②] 且就上文所言“正本”概念观之，对馆臣而言，稿本不过是工作底本，进呈下发后即可在其上随意涂改，甚至裁切叶面，馆臣自然不必在工作本上题署办理人员。实际上，这也是清代敕纂书籍的惯例。（2）阁本著录办理人员姓名，则有裨于实施奖惩。以此观之，重图藏本《简目》同样不符合阁抄本《简目》的特征。

要之，从底稿早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《简目》稿本时间，且版式尤其是版框尺寸、行款同于进呈稿本《总目》，而行款、办理人员题署别于阁抄本《简目》来看，可以推定，重图藏本《简目》与进呈稿本《总目》性质相同，都是为编纂成书、而非抄录的副本。另，张升曾指出《总目》稿本上的断句朱圈是进呈御览本的重要标志，[③] 重图藏本《简目》上同样施以朱圈，可为一证。

至于此本所属的《简目》稿本全本的底稿形成时间，应当就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以前。（1）目前重图稿本仅存一卷，体量有限，似乎难以发现更多异文，以论断全本的底稿形成时间。但实际上，在综合校勘重图稿本、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卷十五后，可以发现内府稿抄本《简目》的文本面貌相对稳定，无须大作调整，应当不需同《总目》稿本一样整卷抽换。（2）目前纂修档案中仅见一次《简目》稿本进呈的记载，在没有出现更多档案或实物之前，重图稿本当即属于此次进呈稿本的残卷。（3）假使存在再次进呈的情况，而重图稿本属于后续进呈的稿本部分，那么前文所言的《离骚图》提要则当有所挖改，而非只有勾删。因此，可以判断重图稿本即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的进呈稿本《简目》残卷。

此外，乾隆年间赵怀玉在四库馆抄副《简目》时，所据的当为《简目》稿本，而非抄本：从版式看，乾隆四十九年刻本也是半叶 9 行，当是在抄副、刊刻时有意保留底本行款面貌。从文本看，国图抄本卷十五有别于重图稿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的异文共有 7 处，属于此本的独特异文，但乾隆四十九年刻本这 7 处文字与重图稿本相同，与国图抄本不同，可证乾隆四十九年刻本非出于国图抄本。[④]

三、《简目》的纂出工作

长期以来，学界一直依据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七月二十五日第一次提出编纂《简目》的谕旨，来判定《简目》纂出时间始于此时。琚小飞等据纂修档案和图书顺序指出，这一谕令只是《简目》编纂的早期设想，《简目》正式编纂始于乾隆四十六年，与《总目》的修订同时进行。[⑤] 此说可信。我们还可以借助相关史料，并进一步比对稿抄本《总目》《简目》，尤其是深入提要正文，来分析《简目》具体的纂出和修订工作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重图所藏系目前仅见存的《简目》稿本，虽然体量有限，也可资说明基本问题。

---

① 文澜阁抄本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的影印出版物未题署协勘官、誊录监生，笔者未睹原本，不代表原本亦无。

②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永瑢奏称：“所有进书表文及应行开列在事诸臣职名，臣等谨分折另缮进呈，请旨一并写入书前，以昭右文盛轨。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603 页）可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。

③ 张升：《上海图书馆藏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稿本解题》，纪昀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》第 1 册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21 年，第 3 页。

④ 兹举 2 例：（1）《华阳集》：“而以其子非熊诗附之。”“附之”，重图稿本、乾隆四十九年刻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同，国图抄本作“附”。（2）《李文公集》：“不能熔铸百氏。”“氏”，重图稿本、乾隆四十九年刻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同，国图抄本作“代”。

⑤ 琚小飞、党瑞林：《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〉纂修考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24 年第 5 期。

第一，《简目》据初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纂出，并吸收了稿本《总目》初次进呈下发后的修改意见。（1）除前述《离骚图》一书外，上图稿本《总目》中的《杜诗详注》后有《类笺王右丞集》一书，此书提要有勾删符，天头写“此篇删”，提要末尾页面被裁。① 检天图稿本和殿本《总目》，《杜诗详注》后为《王右丞集笺注》，不见《类笺王右丞集》，可知《类笺王右丞集》在初次进呈后即被撤出，再次进呈时《总目》已无此书，重图稿本《简目》中同样未见。（2）在相关联的卷次里，② 上图稿本《总目》中调整图书顺序的意见，皆为再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和重图稿本《简目》吸收，除天图素纸抄本卷一五一外，再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的收书顺序与重图稿本《简目》相同。③

第二，《简目》稿本纂出时，《总目》稿本尚未完成初次进呈后的修改。《简目》稿本系与《总目》稿本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呈送御览，但如前文所述，萧云从《钦定补绘离骚全图》在《简目》稿本著录的是早期书名，且此书前后提要字迹一致，当为同一时期内连续抄成，这说明纂出《简目》卷十五时，此书在《总目》稿本中尚未修改。在文渊阁本《简目》中，此书前后的《离骚草木疏》《山带阁注楚辞》二书提要字迹出于一人之手，而《钦定补绘离骚全图》的书名字迹虽与前后两种书相同，提要字迹则迥异。在《简目》稿本和阁抄本中，此书提要皆占据 3 行纸格，可知誊抄文渊阁本《简目》时，此书提要尚未成稿，故书手在写完书名后，可能根据稿本内容篇幅预留 3 行空格，留待后期补入提要。据此推测，针对这类补纂的《简目》提要，馆臣在草拟内容时就需要注意字数问题，以便补入阁抄本时可以恰好填充行格。

第三，《简目》的编纂者当从《总目》纂修人员中抽调组成。如前所言，纪昀参与了《简目》的修订，作为总纂官，纪氏也当密切参与《简目》的纂写工作。检国图抄本《简目》及殿本《总目》卷首职名表，皆设有协勘总目官一职，但未有专言“简明目录”者。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《质郡王永瑢等奏刘权之协同校办〈简明目录〉可否遇缺补用片》所云：“惟查有原派协勘之候补洗马刘权之一员，前后在馆五年，现在协同校办《简明目录》……又查校官祝堃一员，由中书中式进士，改授庶吉士，前后在馆六年，历经派办《总目》及《简明目录》……至派办总目处誊录二十二名、供事八名……及向办《总目》、续办《简明目录》之查校誊录一名、供事七名，均系自备资斧效力行走。”④ 可以认为，《简目》是纂修《总目》的副产品，《简目》纂修官和办理人员应当是从《总目》纂修人员中抽调组成。

值得一提的是于敏中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九日，于敏中致函陆锡熊称：“《进呈书目提要》此时自以叙时代为正，且俟办《总目》时，再分细类批阅，似较顺眼……惟各家俱进之书……似须酌一妥式进呈，方可遵办耳。至《简明目录》此时且可不办，或再蒙询及酌办一样进呈，亦无不可……晓岚先生均此致意。”⑤ 这可说明何以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旨纂修《简目》后，相关工作并未立即开启：当时《总目》尚未编纂，诸多体例未确，故于敏中指示陆锡熊可先拟定《总目》书例，待乾隆帝再度询问时，与办理《简目》事宜一同进呈，并请陆氏将此意见转告纪昀。虽然于敏中于乾隆四十四年谢世，未实际参与后来的《简目》纂修工作，但从此札可以看出早期于氏对《简目》纂修工作的影响。另外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五月二十六日《热河总管

① 纪昀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》第 5 册，第 308−310 页。

② 《简目》卷十五收书对应《总目》卷一四八至卷一五五。其中，初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存卷一四八至卷一五四残页，皆藏于上海图书馆；再次进呈稿本存卷一四八至卷一五二，除卷一五〇藏于国图外，余皆藏于天津图书馆。

③ 卷一五一系性质较特殊的素纸抄本，详刘浦江：《天津图书馆藏〈四库全书总目〉残稿研究》，《文史》2014 年第 4 辑；夏长朴：《重论〈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稿本〉的编纂时间》，《湖南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6 年第 6 期。此卷收书顺序同于重图稿本《简目》所批的修改顺序，也同于殿本《总目》，说明此卷抄本《总目》已吸收再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的书序修改意见。

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604 页。

⑤ 于敏中撰，张晓芝笺证：《四库全书馆密函——于敏中致陆锡熊手札笺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23 年，第 295 页。

世纲等奏查明文津阁并园内各殿宇书籍折》所附《文津阁收存书籍数目清单》云："《简明目录》二十卷，国朝于敏中等撰。"[①] 将《简目》编纂者系于于敏中，也可旁窥时人对于氏在四库馆地位的肯定。而于敏中的通信对象陆锡熊，自然也参与了《简目》的纂修工作。

第四，由于《简目》编纂者有时不能完全领会《总目》原意，同一书的《总目》《简目》偶有内容不合之处。过去人们认为《总目》"删约提要之文"，[②] 而成《简目》，揆诸情理，《总目》《简目》对同一种书的大旨概括和评价也应大略相同。但实际上，编纂者自《总目》析出《简目》时，因时间紧张等缘故，有时未能完全理解《总目》原意，故而撰写《简目》时出现错误，导致同一种书的《总目》《简目》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。试举二例：（1）旧本题晋人程本《子华子》一书，《总目》认为作者是"其殆熙宁、绍圣之间，宗子之忤时不仕者"，[③]《简目》则认为是"南北宋间不得志者"，[④] 二者有数十年之差。出现这种差异，推测是《总目》还提到"此本自宋南渡后，始刊板于会稽"，而《简目》混淆了《总目》谈版本与谈作者的语句，故而在措辞时致误。（2）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一书，《总目》云："末为《右军书记》一卷，凡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，附王献之帖十七，皆具为释文。"[⑤] 以王羲之帖为正文，而以王献之帖为《右军书记》之附录，符合原书情况。《简目》则纂为"末附二王帖释文四百八十二条"，[⑥] 将《总目》分别表述的"末"字与"附"字合为"末附"一词，使二王帖文均被视为该书附录，反而致误。

第五，《简目》自《总目》纂出后，其文本即与《总目》分为两途，其间《简目》虽有受《总目》的修改所影响之处，但二者并非完全绑定甚至同步。这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：一是《简目》成书后的校对工作系单独完成，提要内容并未与《总目》相核。这同样可从文本龃龉处得知，如汉孔融《孔北海集》一书，《总目》云："此本乃明人所掇拾……共三十七篇。其《圣人优劣论》盖一文而偶存两条，编次者遂析为两篇，实三十六篇也。张溥《百三家集》亦载是集，而较此本少《再告高密令教》《告高密县僚属》二篇。"[⑦] 可知馆臣认为《百三家集》所载实为 34 篇。但《简目》纂出提要时，先将篇数误写成"张溥《百三家集》所载凡四十三篇"，在此基础上，下文作"此本又多《告高密令教》《告高密县僚属》二篇，凡四十五篇。其《圣人优劣论》以一篇误断为二，实四十四篇"，[⑧] 篇数皆讹。倘若编校《简目》时取《总目》逐一相验，则不至于有此类错误。二是对于再次进呈稿本《总目》的修改意见，《简目》稿本主要吸收书名、卷数的相关内容，提要正文鲜少修改，如有修改，大多是补充续纂图书等（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互动关系详见下文）。

四、《简目》的重抄：基于国图抄本《简目》性质新论

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，第一份《四库全书》即已办理完竣。根据四库馆工作流程，《简目》纂出后，需分别抄录副本，随库书入阁庋藏，工作流程相当紧凑。但在《简目》纂修早期，由于《总目》改动较大，导致最初誊录的阁本《简目》不得不弃用，重新抄写。要认识到这一情况的存在，则需要借助国图抄本《简目》，尤其是需要先明确此本性质。

---

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附录一之三，第 2392 页。
② 《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弁言，永瑢、纪昀等：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6 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1 页。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17《子华子》，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，第 6a 页。
④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 13《子华子》，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，第 1b 页。
⑤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12《法书要录》，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，第 10a 页。
⑥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 12《法书要录》，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，第 2b 页。
⑦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48《孔北海集》，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，第 27a 页。
⑧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 15《孔北海集》，重庆图书馆藏写本，第 3a 页。

关于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性质，此前学界认为是乾隆四十七年进呈本或誊清本。[①] 通过对比内府稿抄本《简目》，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此本的性质。

（一）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版本性质接近于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

文本方面，经比对，国图抄本与重图稿本底稿文本高度一致，异文处多为书手舛误，抄成时间当在重图稿本修订之前。另外，琚小飞曾就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收书情况做过比对，点明此抄本没有吸收《总目》再次进呈以后的修改，其抄写时间当接近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。可知国图抄本《简目》文本层次甚早。

形制方面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永瑢奏折已明言："《全书总目》《简明目录》及《考证》各部，现在进呈者只系稿本，应俟发下后，另行赶缮正本各四分，预备陈设。"[②] 国图抄本与阁抄本《简目》皆用半叶 8 行格纸，与稿本半叶 9 行的行款有别，知国图抄本当非进呈稿本。

此外，比对国图抄本与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的办理人员名单，可知内府系统《简目》的办理人员较为一致。各卷协勘官由刘权之、祝堃担当，二人分校卷次或有变动，当是为了配合工作进度而有所调度。誊录先后有 23 人，名单也较为固定，由于他们较少参与文本修订，卷次分配更加灵活。变动较大者，是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设有覆勘环节，这与文渊阁、文津阁经过 2 次覆校有关。

要之，国图抄本的版本性质，当与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更接近。

（二）国图抄本属于早期誊抄、以备入阁的抄本《简目》之一

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折云：

> 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，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，发下改正，另缮清本，并遵旨纂出《简明目录》二十卷，于四十七年六月进呈。蒙皇上钦定发下，缮写四分于四阁陈设。现已缮出第一分，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装潢，其余三分缮写将竣，现在校对。谨奏。[③]

这说明了抄出第 1 份《简目》阁本的时间是四十八年正月。同年三月十八日，军机大臣又奏：

> 臣等遵旨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从前于何时进呈及曾否于文渊阁陈设之处，交查四库馆。兹据覆称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及《简明目录》二十卷，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，发下另缮正本四分，于现在缮录。因有各馆未成之书，尚须续纂提要，依类归入，是以未经陈设，现在上紧催办。等语。谨奏。[④]

结合这两份奏折，可以说明，在《简目》稿本进呈后，馆臣确实曾根据最初设想，缮写 4 份正本，且经过校对，拟收入四阁，这 4 份抄本当是相当正式的文本。但当四库书抄成，需要相配的《简目》同时庋置入阁时，抄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前后的 4 份《简目》因为失收续纂书籍，不能反映馆臣最新的工作成果，与《总目》并不相副。比照北四阁《总目》曾经撤回、重缮，可以想见，《简目》或许也经过相似程序。文本层次较早的国图抄本《简目》，当是抄成于乾隆四十八年的 4 份正本之一。

另外，从奏折"上紧催办"之语也可看出，赶抄 4 份《简目》的工作其实十分匆忙，因此，当早期抄成的《简目》可能被弃置后，后期置办正本《简目》的工作当更加局促。观诸国图抄本，誊抄字迹之清晰端正，文本质量之高，皆远迈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，说明办理这一批《简目》时，时间尚且充裕；后期重抄《简目》的工作则十分匆忙，因此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才会

---

① 琚小飞：《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〉版本考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22 年第 3 期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605 页。

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711 页。按，"乾隆四十六年三月"当作该年二月，"四十七年六月"当作该年七月。

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714 页。

留下诸多誊录错误，文本质量远不如稿本《简目》。

此外，国图抄本《简目》上未见钤印，但文渊阁、文溯阁、文津阁、文澜阁抄本《简目》上皆有钤印，这说明国图抄本《简目》虽是作为阁抄本来办理，却可能并未实际庋置入阁。

（三）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校对及其价值

前云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折中有“现已缮出第一分，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装潢，其余三分缮写将竣，现在校对”句，照四库馆办书惯例，这一流程当为缮写—校对—装潢。检国图抄本《简目》原物，与办书流程相符：此本不乏挖改痕迹，部分沿栏格裁切后贴补的纸条因年代久远，已然松动，因而可见纸条皆是贴补于原书纸背之上，说明挖改、割补工作当在书册装潢前完成。

鉴于《简目》稿本仅存残卷，要想推断国图抄本挖改内容为何，需借助底本同为稿本的乾隆四十九年刻本，以及完成时间更迟的文渊阁本《简目》。经比对，国图抄本《简目》挖改后的文本，多与乾隆四十九年刻本、文渊阁本相同，推测单字或数个字的挖改，系更正抄副时形成的讹字或倒字；沿着栏格割补的改动，则是修订抬格错误、缩小按语字号使之区别于提要正文、重抄脱字语句（需挤格书写）等。这既说明《简目》正文形成后即已基本定型，也对了解内府系统《简目》乃至《四库全书》的分校工作具有启发意义。

我们可据此更好地认识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价值：（1）现存《简目》稿本仅可见重图所藏的卷十五，其他卷次或亡佚，或尚未被留意，可提供的校勘空间有限；而国图抄本全二十卷，内容完整。（2）国图抄本文本层次接近于稿本《简目》，文本形态较早，可较为直接地反映《简目》纂修初期的文本面貌。（3）由于誊抄较早，时间充裕，国图抄本的文本讹误较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更少，在现今便于利用的内府全本《简目》中，国图抄本文本质量最善，[①] 值得学者关注及利用。

五、《简目》的修改：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稿本修改的互动关系

要探讨《总目》《简目》稿本修改的互动关系，需要先厘清《简目》稿本修改痕迹的形成层次，即具体的某处修改是发生在《简目》稿本的纂出时期（馆臣誊写稿本时发现有误，随即修改），还是发生在《简目》稿本成型后的修改阶段。在明确国图抄本《简目》的性质之后，可以认为，国图抄本《简目》同于稿本修改稿，该处修改当发生于《简目》稿本纂出时期；国图抄本《简目》同于稿本修改处的底稿，该处修改当发生于《简目》稿本修改时期。下文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探析。

第一，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与《总目》再次进呈本的修改紧密关联，但《简目》稿本修改工作尚未完成时，便开始缮写阁抄本，因此《总目》稿本的部分修改意见虽已为《简目》稿本所吸收，但并未反映在《简目》阁抄本中。书序调整可谓典例：在天图稿本《总目》里，底稿书序为先《鲍参军集》，后《谢宣城集》，但《鲍参军集》有眉批“写于《谢宣城集》之后”，《谢宣城集》有眉批“写于《鲍参军集》之前”，说明馆臣对这两种书序作出调整，殿本《总目》即吸收了相关修改意见。《简目》稿本在这两部书书名上有提笔、捺点的笔迹，表示两书提要顺序互倒，[②] 但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仍以《鲍参军集》在前，以《谢宣城集》在后，没有吸收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意见。《何水部集》《江文通集》二书调整情况也同上。

第二，《简目》稿本的校改具有相对独立性，部分校改内容未同步修改于《总目》稿本。（1）

① 综合比勘重图稿本、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卷十五并分析异文正误后，可知内府稿抄本《简目》虽各有异文，但总体而言，重图稿本谬误少，正确多，其文本质量在诸本中允称最善。国图抄本次之。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文本质量大不如重图稿本、国图抄本。

② 《总目》稿本未见类似的乙倒符号，当系《总目》提要篇幅较长，不便施予此法。

《宛邱集》卷数，重图《简目》底稿作 76 卷，修改稿作 50 卷。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同于重图底稿，说明此处改动发生于《简目》稿本修改时期。按，此书殿本《总目》著录为 76 卷，文渊阁库书题作《柯山集》，50 卷。《总目》云："《文献通考》作'《柯山集》一百卷'，兹集少二十四卷……此本虽不及百卷之完备，然较应麟所云十三卷者，则多已不啻五六倍。"① 知馆臣撰写提要所据底本确为 76 卷本，书名、卷数皆与文渊阁库书不合。检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《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》云："《宛邱集》七十六卷，宋张耒。十本。"《侍读纪交出书目》云："《柯山集》〔五十卷，宋张耒著〕十二本。"② 知当时至少有两部张耒文集呈送入馆，推测馆臣撰写提要所据之本与文渊阁库书的底本并非同一版本。此书《简目》云："耒集在南宋之初已有四本，一本十卷，一本三十卷，一本七十卷，一本一百卷。此本与所记四本皆不合，疑后人以残本重编。然较胡应麟所见十三卷之本，则赅备多矣。"③ 未明确卷数。因此，此处《简目》稿本改动卷数，所依据的当为文渊阁库书，而未复核《总目》，《总目》也未吸收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意见。宋胡宿《文恭集》的卷数著录修改情况与《宛邱集》相同。（2）《西塘集》卷数，重图《简目》底稿作"《西塘集》十卷"，修改稿作"《西塘集》十卷《附录》一卷"。国图抄本同重图底稿，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作"《西塘集》九卷《附录》一卷"。按，殿本《总目》作十卷，提要言此书"附本传、谥议、祠记等为一卷"，《简目》亦言"又附以本传、谥议之类为一卷"。查文渊阁库本，此书依《总目》《简目》书例，当著录为"《西塘集》九卷《附录》一卷"，体例甚明。也就是说，馆臣在核对《简目》稿本时，已经发现《西塘集》的卷数著录不合书例，但《总目》并未吸收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意见。

但也不能排除《总目》纂修官认为《简目》部分修改有误，故不吸收相关意见的可能性。如宋郭祥正《青山集》卷数，重图《简目》底稿作"《青山集》三十卷《续集》七卷"，修改稿作"《青山集》八卷《续集》七卷"。国图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《简目》同于重图底稿，说明此处改动发生于《简目》稿本修改时期。按，此书《总目》《简目》均未言及卷数问题，文渊阁库本确为三十卷。检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《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》云："《青山集》三十卷，宋郭祥正。二本。"《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》云："《青山集》三十卷，宋郭祥正著。三本。"④ 说明此书卷数在四库馆中当无疑义。《简目》稿本将此书卷数改为八卷，或是受同名的元赵文《青山集》影响。赵氏《青山集》共 8 卷，推测馆臣据文渊阁库书复核《简目》稿本时，见赵书为 8 卷，而误改郭书卷数；《总目》编纂者并未吸纳《简目》稿本的修改意见，同时也没有订正《简目》稿本上的误改。

六、余论

《简目》在《总目》初次进呈后，编纂条件才臻于成熟，但二者作为不同文献，修订各有脉络。《简目》提要正文自《总目》纂出时便基本定型，两者修改一致性的关键节点在于《简目》入阁。入阁前，《简目》的纂修多与《总目》趋近；入阁后，《总目》的诸多修订成果便未被《简目》吸收。修订上的不合之处，是分别考察两者纂修过程的重要文本证据。

另外，还要注意不同群体面对同一文献的视角差异：一是编纂视角与利用视角的差异。对馆臣而言，《简目》不过是《总目》的副产品，《总目》的最新修订成果未必需要及时、同步反映在《简目》中；对利用者来说，《简目》反映了清廷的学术成果和学术风向，一经流出便成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54《宛邱集》，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，第 19a-20b 页。
② 吴慰祖校订：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60 年，第 68、184 页。此书用〔 〕括注者，为吴氏据《总目》补入的内容。
③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 15《宛邱集》，重庆图书馆藏写本，第 40b 页。
④ 吴慰祖校订：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第 68、93 页。

为清代学人读书、藏书的重要指南。二是编纂视角与研究视角的差异。对馆臣而言，稿本只是工作底本，文本价值自初级形态至高级形态依次递增，过程性文献的价值自然不如“定本”“正本”；对研究者来说，想要观照文献的整体生命，就需要了解版本，归纳体系，还原过程，并结合更广阔的历史信息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。保存更多原始信息的过程性文献，无疑是我们溯流探源的重要依据。在理解了不同群体的需求与视角差异后，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献、解读文本乃至探析其后更广阔的天地。

通过考察《简目》的版本和纂修过程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：在研究集体修书活动时，实物形制因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，可作为考察版本性质的重要切口。在进行单书版本考察时，应时刻回顾单元研究在整体研究中是何定位，文本的流动和背后的制度、人事是立体的七宝楼台，校勘所得的异文只是这个楼台的影子。我们不可能不关注异文，但应当时刻提醒自己，异文背后有更加丰富生动的景象。

（附记：拙文草成后曾经张升、杨新勋、罗毅峰、葛小寒、琚小飞、张鸿鸣、霍宁宇、郑凌峰等师友指正，尤星藻女士襄助收集材料，在此谨致谢忱！）

References

Ju Xiaofei, and Dang Ruilin. “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 zuanxiu kao” (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“Si Ku Quan Shu Concise Catalogue”). *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* (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) 132, 5 (2024).

Shen Jin. “Gaoben 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” (The manuscript of *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*). In *Shucheng yicuilu* (The librarys’ compendium of collected treasures). Shanghai: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, 1996, pp. 51–52.

An Early Compilation Study on *The Brief Catalogue of the Emperor’s Four Treasuries*: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Court Manuscript and Transcript

CHEN Danqi (School of History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; chendanqi@mail.bnu.edu.cn)

Abstract: After the first submission of the manuscript of *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Emperor’s Four Treasuries*, the staff was drawn from the *General Catalogue* compilers to compile *The Brief Catalogue of the Emperor’s Four Treasuries* from the General Catalog. After the submission in the forty-seven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, *The Brief Catalogue* manuscript absorbed the *General Catalogue* manuscript revisions on the titles and number of volumes of the books and other modifications but rarely changed the text. During the revision of the *Brief Catalogue*, a copy was made in preparation for submission to the cabinet. However,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“General Catalogue” took a long time and had great changes, the text of the “*Brief Catalogue*” should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. However, because the *General Catalogue* was significantly modified,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ty-eighth year of the Qianlong dynasty, four copies of the *Brief Catalogue* transcripts were abandoned, the court transcript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m. The *Brief Catalogue* transcripts collected in *Wenyuange* and *Wenjinge* wer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manuscript, or due to time constraints, there were many errors, and not all the revisions of the manuscript were absorbed.

Keywords: *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Emperor’s Four Treasuries*, compilation, manuscript, transcript